

20 世纪心理学通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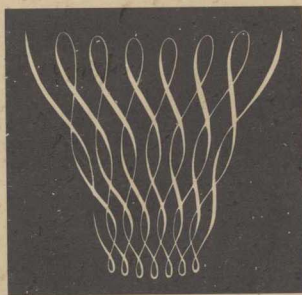
权力主义人格 (上卷)

Psychology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美] 西奥多·W·阿道诺等 著

李 维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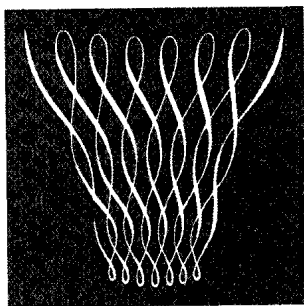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权力主义人格 (上卷)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美] 西奥多·W·阿道诺等 著

李 维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heodor W. Adorno

Copyright©1950 by Theodor W. Adorno

Translation Copyright©1998 by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Inc.(USA)

Copyright Lice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1-1998-20 号

“20 世纪心理学通览”序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相当的年轻,但其源起,却可溯及人类思想的萌芽期。18 世纪之前的心理学思想,散见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官能心理学家、科学革命时期的机械论者等著述之中。到了 18~19 世纪,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若干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包括联想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进化论、科学边缘的研究和实验生理学等,加速驱动着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为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供了基础。然而,心理科学的真正发展则是在 20 世纪。回顾一下心理科学在这百年间所取得的成果,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心理科学自身的地位和作用,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比较的范本,而且可以为 21 世纪心理科学的基本走向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促使心理科学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出版“20 世纪心理学通览”的目的就在于此。

20 世纪的心理学出现了不少流派,成立了许多学术组织,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文献,影响十分广泛。“通览”以 20 世纪心理学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派、一家、一人、一说为选题原则,涉及到的流派有元素主义、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策动学说、格式塔原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历史学派、认知理论、人本主义等。有些学派还可进一步分成若干家系。从每一流派或家系中有所侧重地选出一位创始人或代表人物的学说,从中

可以看到这些学说对 20 世纪心理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它们自身的地位和成就。当然,有些学说所属流派的划分并非十分严格,只能以思想观点大体相近为依据而暂时归入一个流派的名称之下。至于一些跨派别的学术著述,则根据其侧重的研究内容和方向,相应地归入人格、测量、人与社会等类别。

在“通览”中,每本译作都附有译序,旨在对倡导某一学说的代表人物及其学说在 20 世纪心理学中的地位、影响和价值做一基本的阐释,以说明为什么选择该书的理由。至于译序中对历史上同一具体问题的看法,译者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对此,难以强求一律。译序中的观点和结论由译者自负责任。此外,由于同一术语和概念在不同作者和不同时期的学说中表达的意思并非完全相同,所以,专业术语或概念的译名可能不尽一致,甚至同一人名译名,除约定俗成的外,也有可能不统一。对此,在主要术语和所有人名后都附有外文原文,以便读者辨析。

由于资料来源、外国语种、“通览”篇幅等方面的局限,加之我们经验的缺乏,所收的流派还不够全面;由于授权有先后,译作有快慢,很难依照流派活跃的年代、著述发表的年份、流派本身的结构、流派之间的关系等,有顺序、分类别地出版这部“通览”。对这些不足,我们将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适时地调整。对于这部“通览”为什么选定这位代表人物而不是那位代表人物,为什么收入某位代表人物的这部著述而不是那部著述等问题,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来自各方的意见或建议,我们表示真诚地欢迎和感谢。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文版译序

1944年5月,美国犹太人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邀请了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美国学者,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关于宗教与民族偏见的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制订了一项研究计划,以便解决当时的一个主要问题:偏见。对于这个问题,社会科学家拥有各种理论,但却没有找到答案。为此,他们制订了两种研究标准。一种研究标准所涉范围较窄,主要针对社会教育遇到的问题,例如,人们对当时社会生活中若干重大事件的反应,以及对大众传媒在报道团体之间关系时所用方法和技术进行评价。另一种研究标准属于基础研究,目的是充实该领域内的知识体系。

上述两种研究标准由许多子课题所组成,其成果为五部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它们分别从某个侧面阐释偏见的因果关系:第一部著作是由贝特尔海姆和贾诺维兹(Bettelheim and Janowitz)所撰的《偏见动力学》(*Dynamics of Prejudice*),主要探讨退伍军人的的人格特征与其偏见的关系。他们调查了退伍军人的战争经历,因为这些经历通常伴有复杂的焦虑和应激,并且作为一种重要的因素影响人们的生活。第二部著作是由阿克曼和贾霍达(Ackerman and Jahoda)合著的《反犹主义和情绪障碍》(*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该研究以一些来自不同行业的个案为基础,分析其意识和理性之下的因素对个体权力主义人

格的影响。第三部著作是由马辛(Massing)所撰的《破坏的彩排》(*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主要分析社会情境与偏见的关系,因为个体所处的社会情境直接制约着个体作出的反应或个体表现的心理倾向。第四部著作是由劳温塔尔和戈特曼(Lowenthal and Guterman)合著的《骗人的先知们》(*Prophets of Deceit*),主要研究煽动者如何将业已存在的偏见和倾向转化成某种学说,并且最终导致外显的行动,其中包括煽动者的作用、煽动者的鼓动技巧,以及使萌芽状态的感觉转化为特定信念和行动的调节机制。第五部著作就是这次被译成中文的《权力主义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它由西奥多·阿道诺和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Theodor Adorno and Else Frenkel-Brunswik)等人所著。

—

西奥多·阿道诺(1903~1969)出生于德国,求学于法兰克福大学。1931年,他因撰写有关克尔凯郭尔(S. Kierkegaard)的学术论文受到法兰克福大学一些权威的首肯而被聘为法兰克福大学的专题讲师。由于纳粹在德国崛起,他离开了德国,移居英格兰,执教于牛津大学。不久,他仿效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位友人侨居美国。1938~1941年间,他曾受聘于纽约社会研究所。1941~1948年间,他出任普林斯顿·拉杜克社会研究项目课题组长,专司权力主义的研究。1948~1950年间,他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社会歧视研究项目课题组长。

阿道诺的研究领域涉及心理学、哲学和音乐社会学,并因此而闻名于学术界。早在1936年,他曾就家庭与权威的关系问题进行过研究,并著有论著。这一论著为他后来进行权力主义人格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在承接普林斯顿·拉杜克社会研究项目

时,他与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等人协同进行了一项有关权力主义人格和法西斯主义的研究。1950年,他们合作撰写了汇集其研究的心理学代表作《权力主义人格》。在这部著作里,阿道诺认为权力主义是某些人格成分的核心,具有这种人格的人更多地关心权力,包括本身行使的权力和服从上司的权力。

1950年以后,阿道诺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任教,讲授哲学和社会学。由于受到马克思、黑格尔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影响,他努力谋求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的综合。在哲学领域,阿道诺富有批判精神和正义感,坚决反对所有形式的“社会压迫”,不仅是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压迫,而且也包括专制的社会教育和社会文化。为此,他曾著有《启蒙的辩证法》一书,该书在他逝世后的1979年被译成英文出版。

此外,阿道诺还对音乐颇感兴趣。1938~1941年,他在侨居美国期间,一方面为纽约社会研究所工作,另一方面还兼任普林斯顿广播电台音乐部主任。1949年,他发表专著《新音乐哲学》。1952年,回到德国后,他写了一篇颇有争议的论文,分析了瓦格纳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是希特勒纳粹主义的起因。他的音乐社会学代表作《音乐社会学导论》在其去世后的1976年出版。

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1908~1958)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出现在美国的精神分析人格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其成名在于对权力主义的经验主义研究。她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嗣后,便开始用人生进程的观点研究人格。在维也纳大学期间,她致力于精神分析、逻辑实证哲学的研究,参与了当时的“科学统一”运动。由于她是犹太人,因此在纳粹横行欧洲时所遭遇的经历,为她在美国20年间发表富有成果的著述打下了基础。

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吞并,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便逃亡美国,在伯克利儿童福利研究所(后来改称为人类发展研究所)从事心理学研究。当时,以行为主义或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操作主义在美国十分流行。她的到达非常适时,因为人格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等新的专业正在期待精神分析的支撑,以免沦为操作主义的附庸。而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的精神分析和逻辑实证主义知识使她能够捍卫当时精神分析的科学尊严。

在美国,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结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学者阿道诺,并与伯克利民意研究所所长尼维特·桑福德(R. Nevitt Sanford)和丹尼尔·莱文森博士(Dr. Daniel Levinson)合作筹划和发起范围广泛的反犹主义心理学研究。在这一研究中,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负责实施和分析有偏见者和无偏见者的临床访谈。他们的成果《权力主义人格》使得精神分析的临床洞察和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经验主义方法对社会性质和思想意识的研究发生重要影响。虽然该书由于方法论的缘故而受到过尖锐批评,但是仍不失为是对现时仍然重要且尚未解决的问题的不朽论述。

二

《权力主义人格》是一部关于社会歧视的著作。它的目的不在于对一些业已广泛传播的信息补充经验主义的证据。相反,它意欲探讨“人类物种学”这一新现象的崛起。作者将其中一部分物种称为权力主义者。这类权力主义者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权力追求者,他们拥有文明社会的典型思想和技能,但却坚持非理性的感反理性的信念。他们既是开明的又是迷信的,既是普通人又不想成为普通人,既追求人格的独立又倾向于盲从权力和

权威。构成这种矛盾的人格因素,已经引起了现代社会心理学家的关注。本书就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这个问题的。

系统地研究社会歧视的机制,尤其是研究社会歧视的人格类型,并非起始于《权力主义人格》。早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利斯·萨缪尔(Maurice Samuel)、奥托·芬尼奇尔(Otto Fenichel)等人已经勾勒了有关偏见者的心理图景。这些重要的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主义人格》在方法论上达到整合,并且探讨研究结构所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若想把人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既需要明确研究的目标,又需要一定规模的学科综合,而这恰恰是前人所无法实现的。《权力主义人格》的初衷是,以数十年来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基础,将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达到有组织合作水平,除了把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外,还意欲动员在不同理论领域和实证调查中创制出来的各种方法和技术,让它们为一个共同的研究目标服务。例如,在《权力主义人格》中,阿道诺负责介绍与人格因素有关的社会维度,以及与权力主义有关的人格概念,还分析了访谈的思想部分,而这些访谈内容是根据社会理论的类别而展开的。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负责对人格研究中的若干变量进行系统阐述,并对动态定向的类别和访谈材料的量化进行系统地构思。桑福德策划了将各种技术结合起来的方法,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详尽的个案研究方面,尤其涉及偏见人格的动态病因。莱文森则主要负责 AS 量表、E 量表和 PEC 量表,以及运用心理学术语对测量结果进行整理,包括对投射材料予以分析,对统计方法和操作步骤进行设计等。这样一种使不同的社会科学和心理学分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方法充分体现在本书之中。社会理论、深蕴心理学、内容分析、临床心理学、政治社会学和投射测验等领域的专家彼此交流他们的经验

和研究成果,经过密切的合作,向读者展示了他们的成果:现代权力主义的要素。

现代权力主义的核心要素是偏见和歧视。偏见是指对某些特定群体或成员持有某种否定性的消极认知和态度,这种认知和态度通常是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的。歧视是指由偏见的认知和态度引起的直接指向偏见目标的否定性消极行为。歧视源自偏见。凡有歧视的行为,必有偏见的认知和态度。偏见和歧视所针对的某些特定群体或成员,常与宗教、种族、政治或文化等有关。

偏见作为一种态度,有其认知的、情感的和行为的成分。个体对某些特定群体或成员的偏颇预期,就是偏见这一态度的认知成分。偏见者在以偏颇的预期作出认知反应的同时,会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也就是说,在与偏见的对象接触时,不论是直接的接触抑或间接的接触,都会产生消极的情感体验,而这正是偏见态度的情感成分。偏见的行为成分表现在,偏见者用消极的行为方式对偏见的对象实施行动。当这种倾向在外显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时,歧视也就发生了。

偏见是以不正确或不全面的信息来源为基础的,偏颇的预期具有定型或刻板的特点,而偏见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则带有过度类化的倾向。定型和类化导致偏见者忽视个体差异和条件差异,并为第一印象的感受和判断所左右,根据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社会背景对特定群体及其成员进行归因。偏见作为一种不当的认知和态度,一旦被具体化为外显的行为,就会出现歧视。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制约行为的因素,以防御已有的偏见转化为歧视,但在特定的情境里,个体的偏见不免借行为表现出来而发生歧视。歧视的表现程度高低不一,低程度的歧视有情感色彩的言语贬抑或社交回避,高程度的歧视有暴力

行为的表现等,歧视发展的极端便是灭绝种族或宗教的屠杀。

在《权力主义人格》一书中,作者对偏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研究,并由此派生出一些新的术语和新的方法。新的术语如“表面敷衍”等,它是歧视的一种微妙而曲折的表现形态。人们对高歧视和低歧视是容易辨识的,正如《权力主义人格》中提到的两个个案那样。但是,有不少社会歧视是非两极化的,它们既不极端的高,也不极端的低,而是以明显的迁就和表面的积极来对偏见的对象作出行为反应,目的是以甚少的代价作为换取自己在今后作出实质性的歧视行为的托词或借口。新的方法涉及态度测量的模式。在评定人们偏见的性质和程度时,需要对其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成分逐一进行测量。认知成分的测量属于成见评定,通常运用特质的项目,要求被试指出哪些特质与哪些群体相连。情感方面的信息一般是通过态度量表获得的,量表的设计是为了测量个体对特定群体的积极情感或消极情感,包括向被试呈示一系列性质相反的形容词,要求他们按此对特定群体作出相应的选择,或者呈示有关某个特定群体的一系列陈述,要求被试指出自己倾向于赞同还是反对这些陈述。行为成分的评定采用社交距离量表,也即向被试呈示个体与特定群体之间假设关系的项目,它们表示被试与群体成员之间不断递增的接近或亲密的等级,其范围从最低层次的邻里交往或同事沟通到最高层次的相互通婚,然后要求被试指出自己愿意在何种亲密等级上接纳该群体成员且与之交往。

三

《权力主义人格》将偏见和歧视的研究与种族偏见和歧视联系起来,对种族中心主义予以了精辟的分析。种族中心主义这

一术语最早是由威廉·格拉汉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于1906年在其《社会习俗》一书中提出的。萨姆纳运用这个概念意欲表达下面两层意思:(1)人们观察自身团体的一种倾向,并且以此为标准去评价所有其他的团体;(2)认为自己团体比其他团体优越的一种倾向。虽然上述两层意思至今仍在一些学术圈子里使用,但是种族中心主义这一术语更多地是指第二层意思,即认为自己的团体比其他团体更加优越。这个术语常与“内团体”和“外团体”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所谓内团体是指个体所属的团体,所谓外团体是指个体所属团体之外的任何团体。

萨姆纳最初认为,种族中心主义是一种“人类本性的事实”。为此,他列举了摘自各种人种史和历史记载的75个确实无疑的实例。然而,今天赞成这一观点的研究人员已经寥寥无几。现在,社会心理学家的基本共识是,种族中心主义并非一种“人类本性的事实”,而是特定环境的产物。所以,《权力主义人格》的研究主要指向:(1)产生、增强和减弱种族中心主义的基本原因;(2)消除社会领域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实际意义。其中,尤以第一方面的研究为重。

关于种族中心主义产生原因的研究,可以根据研究人员的不同研究角度而予以分类。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第二类是人际动力学的研究;第三类是社会结构的种族中心主义研究。《权力主义人格》属三类研究的综合。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作者试图以法西斯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为背景。揭示导致团体外敌视的根本心理原因。他们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种族中心主义的人格动力结构,提出了所谓的权力人格。造成种族中心主义的心理动力包括压抑、投射和否定,而所有这些因素均会产生对其他团体的仇恨。权力综合征的起因可

以追溯到童年时期的家庭经历。在人际动力学研究领域,作者广泛引用了种族中心主义的参照团体理论。该理论特别注重团体对其成员的吸引力,以及这种吸引力与成员对其团体的忠诚程度之间的关系:当团体对其成员具有奖励效应时,预示着内团体忠诚的增强;当内团体为某些利益与外团体产生竞争时,内团体的忠诚可望增强;当内团体成员自以为自身的利益遭到外团体侵犯时,就会发生对外团体的敌意。人际动力学理论被看做是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种发展,因为它同时为消除种族中心主义提供了一种途径。也就是说,当内团体成员既处于社会分裂状态又不能提供社会奖励,而外团体不仅强大而且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时,个体的种族中心主义可能被消除,致使内团体成员逐渐尊重和接纳外团体成员而成为其伙伴的敌意对象。在社会结构研究领域,作者是从社会结构的组成来揭示种族中心主义原因的。例如,内团体的领袖之所以将一个外团体看做一种威胁,是因为这样做对维护团体内的秩序和驱力十分有利,由此导致种族中心主义的增强。在该领域,人类学家认为,团体所处的文化特征既能促进种族中心主义也能阻碍种族中心主义,正因如此,研究种族中心主义需要关注不同文化的亲属关系、权力分配、忠诚的结构,以及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同化和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顺应。

尽管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各自提出了一些减弱种族中心主义的方法,但是,由于它们的研究限于某一方面,因而必然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正如《权力主义人格》所述,种族中心主义可能具有各种不同的根源,其中,有些起因不能戏剧性地发生变化(例如,社会的亲属结构、特定的亲子关系等)。为了减弱种族中心主义,研究人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接触假设”和“超层级目标”。就“接触假设”而言,研究人员调查了各种种族

杂居现象,结果发现,通过增加不同团体成员之间的接触,有助于减弱团体之间的敌意,促进积极的相互关系。然而,后来的许多研究表明,要使接触产生上述的效果,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包括不同团体的成员在共同决策时必须拥有相同的发言权,以及在共同的团体生活中必须拥有相等的地位。此外,研究人员在调查竞争性团体的过程中,提出建立一个共同的“超层级目标”,也就是说,当不同团体的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工作时,种族中心主义将会被减弱。

四

《权力主义人格》还研究了权力主义者与其所处阶层的心理结构、特征、功能,以及形成与变化。阶层心理由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所构成,包括需要、兴趣、情感、理想、信念、世界观、态度、舆论、传统和道德氛围等成分。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和社会作用,因而它们之间在观念、信念、理想、动机、愿望、兴趣和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乃至对立,从而形成不同阶层者的不同的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行为取向,也即不同的人格心理特征。

《权力主义人格》从三条基本途径研究各种阶层心理:(1)研究历史和当前存在的各种具体阶层的心理特征;(2)评述特定时代的各种阶层的不同心理特征,尤其是创造时代特色的各种阶层的相互关系;(3)分析阶层心理与阶层成员心理的互动,以此了解团体心理和团体成员心理的相互关系。

上述三条基本途径涉及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团体社会心理的结构,二是社会阶层的标签。就团体社会心理的结构而言,关键在于考察阶层心理的一些重要因素。例如,阶层的需要。这

是《权力主义人格》中社会情感范畴的一个因素。既然阶层地位决定了每个成员拥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数量和组成,那么阶层地位也就决定了阶层的需要结构,以及每种需要的相对的心理意义和权重。又如,阶层的兴趣。阶层的兴趣是由包括该阶层的整个关系系统所决定的。《权力主义人格》从社会心理角度提示了在阶层层次上形成的阶层兴趣是如何决定个体行为的。此外,阶层兴趣是作为整个阶层的兴趣而形成的,然而,阶层的每个成员不仅参与属于本阶层性质的团体,而且也有可能参与许多属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团体活动,因此阶层内部就会出现若干按收入水平、职业地位、技术能力等划分出来的亚团体,加上一个阶层的成员可以同时又与另一个阶层的成员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各种兴趣的相互交错,而其中每种兴趣都是由社会团体的从属关系决定的。

就社会阶层的标签而言,它是一种将某些特定的个体及其行为归入某一类别,并且予以定性或界说的倾向。《权力主义人格》抨击了标签论所谓少数民族成员和社会阶层较低成员容易犯罪和变态的评定。它将数据和分析两者结合起来,为现代标签论提供了一个实例。例如,美国黑人为社会地位而奋争,往往会被界定为两种相反的定义。第一种是,他们不满现状,敢于冒险和拼搏,希望提升自己目前的社会层次等;第二种是,他们的奋争意味着一种邪恶的信号,因为他们本质上是无所事事的、游手好闲的、懒惰的、好攻击的等。此外,这种标签还会发生渐变,即从奋争行为是邪恶的观念出发,进而将行为者本人视作是邪恶的。一旦行为者接受这样的归类,则他们就会在被归属的同类群体中表现出相应的举止,这也就是所谓的标签作用。

《权力主义人格》指出,有些人之所以把社会阶层作为背景,认为少数民族成员和社会阶层较低成员容易犯罪,是因为他们

原本不是根据该行为的本来性质来赋予犯罪行为这种特征的，而是阶层意识或团体意识所强加给他们的定义。也就是说，由于邻里评价、学校教育、司法机关，以及犯罪矫治机构在处理这些阶层成员的行为时，给他们贴上了顺应不良的标签，致使不仅行为者本人会在不知不觉中修正自我的印象，而且社会也会由此营造一种不利的评价氛围，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使之陷入更为严重的困境，甚至真正犯罪。由此可见，社会阶层的标签论实际上是关于行为、思想、人—环境相互需要的评定依据。标签论表明人—环境相互需要的可定义性，并引起异常行为。在异常行为产生的过程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社会对行为的反作用。所以，与其他一些评定个体或社会异常情况的理论相比，《权力主义人格》所说的社会阶层标签，其中心思想是社会对个体行为的反作用所产生的影响。

《权力主义人格》还指出，社会阶层的归类及其派生的行为，包含两个关键的制约因素：(1)立法者创立了迎合本土文化的行为规范和法律范畴，并对此进行阐释，从而建立准则，而不考虑少数民族的外来文化；(2)官方的控制机构，尤其是警察、检察官和其他具有政治权力的人物，对这些准则赋予了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并且运用这些准则将有些个体或团体同其他个体或团体分离开来，甚至把前者界定为容易出问题的个体或团体。对那些少数民族成员和社会阶层较低成员来说，上述两种贴标签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内在含义。具体地说，所谓社会阶层较低成员的问题行为，是社会阶层较高成员对前者的特定行为的反作用引起的，而那些具有贴标签能力的个体或团体，则是“有影响的人物”，他们运用分类标准将某些个体或团体予以归类，结果，有些行为就被视做“异常行为”，有些个体或团体就被说成“越轨者”或“顺应不良者”。